

国家翻译学视阈下的外交口译研究 ——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同声传译为例

李青, 李悦*, 覃家珍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与南亚东南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DOI:10.61369/HASS.2025030009

摘要 :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是中外媒体获取中国外交政策信息的重要平台, 已成为观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微观镜像。会议中的口译活动不仅是外交沟通的桥梁, 更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 参与塑造了多元化的大国形象。本文基于国家翻译学理论框架, 建构“行为功能自利性—行为实施自治性—行为主体自发性”三维分析模型, 以2025年外交部记者会同声传译语料为基础, 探讨外交口译的实践特征与运作逻辑, 揭示其在国家对外话语传播中的角色与价值。

关键词 : 国家翻译实践; 外交口译;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Research on Diplomatic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 A Case Study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t the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i Qing, Li Yue*, Qin Jia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South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 The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s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rve as a crucial channel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and have become a microcosm of the distinctive diplomacy of a major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akes place during these conferences not only functions as a vital conduit for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but also exemplifies the hallmarks of state-sponsored translation practice,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versified national image.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ate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model—interpreter's functional self-interest, procedural autonomy, and actor's initiative. The paper used the 2025 corpu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s press briefings, examines the practical features and operative logic of diplomatic interpreting, thereby illuminating its role and value within the broader project of China's external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Keywords : 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 diplomatic interpreting;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引言

如今,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国家外宣的核心环节与战略支点, 重要性日渐凸显。此时外交口译质量显得尤为关键, 它关系到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动态、政策立场、国际事件等要素的传达。外交口译虽以译员为主体, 但其内容必须经过反复商榷和思量, 一些政策性的表达应有固定的形式, 情感态度也需拿捏得恰到好处, 因此译员会尽量避免个人特色和情感偏好对口译工作产生干扰, 具有较低的灵活性^[1]。诸如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这样的数次关键外交事件中, 国家经由翻译表达立场, 阐述主张, 通过与外交对象的话语合作、话语共谋、话语博弈, 达到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国家形象等目的^[2]。译员进行的战略性对外跨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 承载了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构建框架与大国形象树立职责。本文从国家翻译学理论视阈出发, 以2025年外交部记者会同声传译语料库为实证基础, 以探讨外交译员选拔培养、外交口译整体特点以及伦理规范等问题。

作者简介: 李青 (1999—), 女, 云南昆明人, 在读硕士, 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 李悦 (1975—), 女, 云南玉溪人, 硕士, 副教授, 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与研究、文化对比研究。

一、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外交口译

国家翻译实践（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指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本质上是制度化翻译^[3]。因此，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进程中的国家翻译实践在行为目的、行为实施和行为主体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是国家经由翻译进行外交话语实践的典型案例。

（一）外交口译行为功能的自利性

国家翻译实践具有显著的功利性特征，是从国家利益需求出发的自我生产。国家通过外交活动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这些利益经过相互转化，最终指向“国家知识生产、国家形象塑造和国际形象建构”^[2]。译员不仅传递信息，更承担着传播国家立场、回应外部质疑、强化话语权的职责，是国家政治利益与外交战略的语言执行者。

（二）外交口译行为实施的自主性

外交翻译工作受到国家翻译政策的指导。翻译作为文化活动经常受到政治、经济、出版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体现在基于特定领域的政策手段上。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的政策手段也不相同^[4]。国家利用权力与权威，决策外交活动的发起和实施，建构外交口译的生产机制，对译员配备和翻译流程进行全局性、专业性的规划，使外交口译实践处于服从服务于国家进而由国家自治的状态^[5]。译员虽在国家话语框架内执行任务，但在面对突发外交议题时，具备即时判断与策略表达的操作空间，体现出制度赋权下的有限自主性。

（三）外交口译行为主体的自发性

为满足外交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初期就开始建立各种专门的外交机构，从编译科，翻译科到翻译室。翻译部门规模不断升格映射出国家对翻译组织结构的规制。外交翻译机构可视作“在国家意志之下，建立超乎个体意志之上，有统一制度和规则的约束性机构”^[6]。国家－机构－译员构成的三位阶口译主体，被国家赋予权力和资本，共享制度化身份，不受外力影响，体现出外交口译行为主体的自发性^[9]。外交口译员不仅履行任务，更在国家意志引导下主动适应外交情境、调节话语策略，成为国家语言传播中的积极推动力量。

综上，外交口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国家翻译实践中有组织、有策略、有意识的政治性行为实践，充分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与外交目标在翻译活动中的深度嵌入。

二、基于语料库的外交口译实践模式分析

本文基于2025年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以及各大媒体问答的同声传译译本语料，围绕外交口译功能行为的自利性、外交口译行为实施的自主性以及外交口译行为主体的自发性

对其实践模式进行分析。

（一）自利性功能的语料特征

外交口译中“自利性功能”的体现，主要通过术语表达的策略调控和话语演进的议程设定来实现，其核心目的是服务国家外交目标、塑造国家形象，并引导国际话语接受路径。以下两个例子典型体现了这一趋势：

例1:

SL: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表1

年份	高频译法	出现频次	国际媒体采纳率
2016	part of China	87%	62%
2021	inseparable part of China	93%	71%
2025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	98%	83%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s territory”作为近年来外交译稿中的高频表达，明显带有国际法理绑定意图。“inalienable”一词暗含《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使涉台表述从原本的政治立场陈述升级为具有国际法依据的法理宣示。此类译法通过高频使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术语，构建出一条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国际传播力的“法理话语链”，强化了对中国国家主权立场的国际合法性支撑。

例2:

SL: 人类命运共同体

表2

译法版本	外交部语料库频次	联合国文件引用次数
common destiny	127	28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358	67
global community	572	29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外交理念，其译法不断演进，从最初的直译“common destiny”逐步演变为“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乃至更具全球包容性的“global community”。其中，“shared future”强化了合作共建的语义，“global”则淡化了文化特异性，增强了话语的普遍性和可接受性。译法的动态调整不仅提升了术语的国际传播力，也促进了中国发展理念向国际共识的转化。采纳率的提升说明这种译法策略有效提升了国际舆论的认可度。

上述两个例子分别展示了外交口译中话语术语选择的政治目的性与传播路径的战略调节性。译者在国家主导的翻译实践中，既执行语言转换任务，也承担着“话语建构者”与“利益维护者”的角色，体现出外交口译服务国家核心利益的自利性功能。

（二）自治性机制的运作特征

“自治性”指外交口译行为虽然服务于国家话语体系，但在具体执行中表现出高度的制度内自我调控与策略性选择^[7]。这种机制并非完全受控于某一权威指令，而是基于口译员对外交政策、语言策略及交际情境的深刻理解，在规范约束框架内的自主执行^[8]。2025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语料展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自治性机制：

例3:

SL: 中欧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应加强协调, 应对美国单边加征关税的挑战。

TL: China and the EU, as the second and third largest economies, are committed to upholding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resisting unilateral tariff measures through enhanced coordination.

Analysis: 在原文中明确指出“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挑战”, 但译文巧妙地省略了“美国”这一主语, 将其替换为“unilateral tariff measures (单边关税措施)”。这一处理策略体现出译员在面对敏感外交议题时的主动调适能力, 在不偏离原意的前提下, 规避直接指责特定国家, 以符合多边外交场合的表达需要, 展现了高度的表达自治性。

例4:

SL: 根据中国《外交关系法》和《反外国制裁法》, 中国决定对美国在此问题上行为恶劣的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TL: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Law and the Anti-Foreign Sanctions Law, China has decided to impose visa restrictions on US personnel who have acted egregiously.

Analysis: 该译文将中国的法律依据精准转译, 完整保留了《外交关系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的正式法名称, 并使用“egregiously”强化“行为恶劣”的语义力度。这种用词并非简单对等翻译, 而是在法律话语和外交立场之间进行精准调和, 不仅反映了制度规定下的统一立场, 也展示出译员对表达风格、法律语气和国际效果的自我调节能力, 体现了术语与语气双重层面的自治操作。

这两个例子分别体现了了外交口译实践中的两类“自治性机制”, 即话语主语的调控回避机制与精确表达机制。两者均为在制度授权框架内, 译员灵活执行外交表达任务的体现, 突出了外交口译行为的“有限自治性”特征。

（三）自发性主体的行为模式

在外交口译实践中, 译员作为“国家-机构-译员”三级结构中的一环, 虽然处于执行端, 但其行为并非完全被动受控。他们在国家体制赋权下, 拥有制度化身份, 在重大外交议题中自觉履行使命, 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认同、责任意识与话语敏感性。这类行为虽源自国家意志, 却体现为一种译员层面的自发实践行为模式。

例5:

SL: 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借口, 任意对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违反了国际法和基本国际规范……中国决定对美国在此问题上行为恶劣的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Analysis: 在此回应中, 译员准确使用了“arbitrary visa restrictions”“under the pretext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等术语, 不仅保留了中文原文中的政治立场与情绪表达, 还通过选择“egregiously”强化了行为性质的严重性, 从而构建起中方反制的合理性与对等性逻辑链。这类译法没有仅限于字面转换, 而是主动配合国家政治立场进行语义强化与价值引导, 体现出译员对国家核心议题的高度敏感与主动介入, 展现其行为模式的“国家认同驱动下的自发履职^[9]”。

例6:

SL: 美国将关税作为武器, 谋取私利, 把自身利益置于全球公共利益之上……中国与欧盟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

Analysis: 译员在英译中使用了“uses tariffs as a weapon”“economic bullying”“firm defenders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等关键词, 不仅强化了原话语的批判色彩, 也引入了国际政治话语中通用的修辞与立场标签。这类语言处理表明译员并非单纯传递信息, 而是在符合外交话语逻辑与伦理前提下, 主动执行外交表达的策略性, 以国际社会更易接受的术语强化中方立场, 体现其“制度角色内化后的行为自觉^[10]”。

这两个例子表明, 在制度化语境下, 外交口译译员的行为模式并非“命令式回应”, 而是具备高度的自发性与使命驱动。这正是国家翻译实践中译员作为制度型主体的重要体现, 展示了口译实践中自发性行为的典型路径。

三、外交口译实践难题与发展建议

当前外交口译实践面临三大核心问题: 一是译员选拔与培训不足, 高水平同声传译人才稀缺, 现有培养体系与实战需求脱节; 二是术语标准化欠缺, 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存在多种译法, 影响传播一致性与国际接受度; 三是对外传播适应性不足, 在坚守国家立场与增强国际可理解性之间难以平衡, 易造成表达过激或误读。这些问题分别对应口译实践中的“人、内容、效果”三大关键维度, 亟需系统优化与机制支持。

表3

维度	当前问题	优化建议
人（译员）	译员储备不足, 外交知识薄弱	建立认证、训练和在岗机制
内容（术语）	翻译不统一, 缺乏标准	建术语库、加强传播测试
效果（传播）	表达难兼顾立场与接受度	建指南、引入外籍审稿、评估传播效果

通过在这三方面的系统建设, 可有效提升我国外交口译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国际影响力, 为国家翻译实践战略提供坚实支撑。

四、结束语

本文基于国家翻译学的理论视角, 以中国外交部2025年例行记者会的同声传译语料为基础, 构建“自利性-自治性-自发性”三位一体的外交口译行为分析模型, 探讨了外交口译在国家

翻译实践中的功能特征与运作机制。

研究发现，外交口译行为不仅具有服务国家利益的明显自利性，还在执行过程中展现出高度的制度内自治能力与译者主体的自觉性、自发性，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口译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形态。“行为三性”模型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外交口译实践本质的理解，也为进一步研究国家翻译如何通过语言介质塑造国家形象、影响国际认知提供了理论支撑。该模型揭示了译者作为国家话语传播中的中介主体，其行为并非完全被

动，而是在制度赋权与外交目标引导下的策略执行与价值表达。这一视角将翻译行为纳入政治传播与国家话语工程的整体结构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总之，外交口译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连接内外、传递国家意志、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深入研究其行为逻辑与制度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国家语言治理体系的战略价值，也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参考文献

[1] 陈伟婧,任卓阳,王梓安,等.外交口译中“中国英语”的相关表达及分析[J].海外英语,2023,(14):62-65.
[2] 任东升.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内涵和框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33-42.
[3] 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实践初探[J].中国外语,2015a(3):92-97+103.
[4] 滕梅.翻译政策研究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J].上海翻译,2014(1):35-39.
[5] 詹成,张晗.(2024).国家翻译学视阈下的外交口译研究——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口译活动为例.《翻译学刊》,(2).
[6] 任东升,高玉霞.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J].中国翻译,2015b(1):18-23+126.
[7] 任东升.(2022).国家翻译实践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8] Tipton, R. (2020). Institutional Translation: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Routledge.
[9] 任东升,高玉霞.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译.《中国翻译》,2015(1),18-23+126.
[10] 任东升,高玉霞.国家翻译行为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J].外语研究,2015(3):18-22.